

doi: 10.3969/j.issn.1008-6439.2009.04.013

金融危机下应对区域增长差异的财政政策 ——以层次分析法 (AHP) 对个案的研究*

邵学峰^a, 郝诗凝^b

(吉林大学 a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b 经济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区域差异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会在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过程中被放大, 延缓经济恢复增长的时间, 并进一步扩大区域增长差异。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逐渐拉大在我国是一个普遍的现实问题, 会导致市场潜力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资源配置弱化。因此, 借助政府行为, 特别是财政调控政策纠正市场低效是必然的选择。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发挥财政功能推动区域均衡增长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应利用金融危机缩小区域增长差异, 其中, 来自于中央财政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和体制性监管则尤为必要。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区域增长差异; 财政政策; 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 F831.59; F812.2;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6439(2009)04-0100-08

Fiscal Policy Dealing with Regional Growth Differences under Financial Crisis

—In Case Study by AHP

SHAO Xue-feng^a, HAO Shi-ning^b

(a China State-owned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12;

b School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differences may enlarge systemic risk in cyclical fluctuations, delay the economic recovery, and further expand regional growth differences. It is a universal social problem tha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growth become bigger and bigger and can lead to insufficiently playing market potential and weaken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us, governmental behavior, especially using financial regulation polic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correct low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The breaking out of financial crisis brings an opportunity to play financial function to promote regional balanced growth, as a result, the financial crisis should be used to shrink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among which, the financial support, policy support and system supervision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are very important.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regional difference in growth; fiscal policy; AHP

* 收稿日期: 2009-05-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07JC790074) “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与县级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 邵学峰 (1971—), 男, 山东招远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郝诗凝 (1988—), 女, 天津人,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言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理论层面上,金融危机引起了学者们认真研究和重新审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反思部分西方国家一贯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地位。在政策层面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等经济系统的波动暴露了政策体系的相关问题,显现出各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失灵和不足,也对政府重新整合政策资源和优化配置经济资源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众多领域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通过政府财政政策的调整缩小区域增长差距,实现政府稳定社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职能。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也日渐显著,在地区之间存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异,在同一地区内部也出现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区域增长差异过大无疑会增加全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成为产生和扩大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潜在隐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任何一国(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都会对其他国家(地区)造成影响,从这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经济影响可见一斑。因此,通过财政政策缩小区域增长差异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必须采取的政策选择,还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整合社会资源、化“危”为“机”的重要举措。

本文以天津市作为个案,分析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过财政政策缩小区域增长差异的有关问题。天津作为我国的直辖市和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处于全国前列,但同时,天津市所属各区县也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增长差距日益扩大。这种不均衡的增长不利于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甚至会成为天津市提高整体经济实力的严重阻碍。因此,对天津市各区县经济增长差异进行研究有助于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其所产生的原因和寻找有效的解决途径,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高。

一、文献回顾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多流派的综合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结果。国外的文献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和非均衡增长理论两个体系。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水平将趋于收敛,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但是,对于一般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市场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均衡发展理论采用静态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似乎相对简单化,不能完全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状况。相比较而言,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指导意义。主要代表有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赫西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以及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认为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但是,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则存在较大的争议。增长极理论等更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总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达到较高程度时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从国内的文献看,借鉴西方区域发展的有关理论,国内学者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若干理论模式。夏禹龙、冯之浚(1982)认为,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原因,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客观存在着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梯度,可供选择的策略是高梯度的东部地带掌握先进技术,逐步向梯度较低的中西部推移。随着经济发展,推移速度加快,可以逐步缩小三大地带间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刘再兴(1986)认为,技术空间转移要遵从提高社会效益的原则进行,强调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可能性,但并未否定梯度转移,只是对梯度理论进行补充完善,称之为反梯度理论。陆大道等(1995)吸取了佩鲁增长极理论的有益思想,

提出点—轴渐进式扩散的理论模式,认为社会经济运行客体大都在点上聚集,并通过线状基础设施而连成一个有机空间结构体系。随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开发的注意力会更多地放在较低级发展轴和发展中心上,同时逐步向不发达地区延伸,并由此设计了沿海与长江流域相交的 T 型空间发展战略。厉以宁(1997)认为在中国用东中西三大地带研究区域问题过于简单,若以专区或市为单位,按人均收入水平把各专区或市分为富裕、中等、贫穷三类,会发现贫穷地区集中分布于几省相接地区,富裕地区集中分布于沿海或中部沿大江大河的大中城市周边,中等地区处于富裕和贫穷地区之间。根据这种方法能较好地梯度推移和中心辐射结合起来说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用各种方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研究。但是,国内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多集中于省级以上行政单位,探究区域经济大格局的变化。由于选取的地理单元过大,难免会忽略区域单元内部的非均质性,从而掩盖区域内部的巨大差异,削弱研究的实用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选取了相对较小的区域——天津市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与很多现有研究成果中选取或单一或双重指标、使用多元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相关分析不同,本文选取若干对经济水平具有代表性说明作用的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地区综合经济水平指标体系;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后,运用线性加权模型,得出天津各区县综合经济水平评价指数值,进行实证分析。笔者认为,对个案的研究有助于提供分析区域增长差异的相对基础性的数据和视角,提供近些年来导致区域增长差异的相对“微观”的解释,以利于采取包括财政在内的一系列政府政策缩小区域差异,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进一步优化社会经济资源,促进全社会在和谐中实现稳定增长。

二、数据和模型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天津市 2007 年统计年鉴》、《中国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方法研究》以及《天津市人口普查资料》等。目前,天津市共辖 15

区 3 县,其中包括中心区(和平区、南开区、河西区、河东区、河北区、红桥区)、滨海新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新六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三县(宁河县、静海县、蓟县)。为了数据处理的简便及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将中心区的六个分析单位作为整体考虑,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厘清各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

2 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分析天津市所属各区县的经济增长差异。层次分析法将相关问题看作受多种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因素影响的系统,将这些因素按照它们之间的隶属关系排成从高到低的若干层次,以此构造递阶层次结构。然后通过比对,对各种方法(或措施)排出优劣次序,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以辅助决策。其主要特点是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将主观判断用数量形式表达出来并进行科学处理,因此,这种方法更适合对较为复杂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而较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同时,这种方法虽然有深刻的理论基础,但是表现形式简单,容易被理解接受。当然,由于权数的设定和观念及价值标准的差异性,通过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程度不同的主观色彩。

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变量的主观性,本文采用了线性加权评价模型合成综合指数。通过将数据无量纲化,根据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赋予其权数,加权计算得到综合指数。采用的模型如下:

$$Y = \theta_0 + W_i \sum_{i=1}^n X_i + \epsilon_i$$

其中, Y 为系统的综合评价值; θ_0 为截距项; X_i 为相应指标的观测值; W_i 为对应指标的权数; $i=1, 2, \dots, n$; n 为指标的个数; ϵ_i 为与解释变量无关的扰动项。

本文所采用的样本为绝对数,通过计算天津市人均占有的社会资源测算区域增长差异。各变量的统计意义如下: X_1 为人均 GDP, X_2 为人均财政收入, X_3 为人均进出口商品额, X_4 为人均消费额, X_5 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由于评价体系中各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因此需要将数据标准化,以建立相应的标准数据库。本

文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参照孙红玲(2007)的方法,采用的公式为: $X_i = \frac{x_i - \bar{x}}{s}$ 。其中, X_i 为处理后标准化的数据, x_i 为原始数据, \bar{x} 为原始数据的均值, s 为

原始数据的修正标准差。测算得出天津市各区县相应指标数据(如表1)。

表1 统计描述

分区	X_1	X_2	X_3	X_4	X_5
中心区	-0.4095	-0.3720	-0.8728	0.9917	-0.3597
塘沽区	2.0021	0.8871	-0.4050	1.2751	2.5766
汉沽区	-0.6104	-0.5064	-0.5563	-0.3507	-0.2978
大港区	1.0863	-0.2678	-0.0535	-0.0229	0.0382
东丽区	0.6430	1.5367	0.8968	0.7298	1.0025
西青区	1.2590	1.8517	0.5999	1.0923	1.2306
津南区	-0.4528	0.0751	0.2060	0.7865	-0.5808
北辰区	0.6599	1.0699	2.7852	0.8712	-0.3187
武清区	-0.8237	-0.5140	-0.0407	-1.0129	-0.6088
宝坻区	-0.9921	-0.9536	-0.4267	-0.8830	-0.6584
宁河县	-0.8970	-0.9083	-0.7911	-0.7674	-0.5777
静海县	-0.5198	-0.8947	-0.4607	-1.1337	-0.7155
蓟县	-0.9453	-1.0035	-0.8812	-1.5761	-0.7305

资料来源:根据《天津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版)计算所得

三、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通过给出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赋值,对赋值建立相应的判别矩阵,并计算出每个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及对应的特征向量。参考孙红玲(2007)等,表2给出了本文所采用的各指标重要性赋值。

表2 指标赋值

顶层指标	基础指标名称	权数
Y	X_1	0.6429
	X_2	0.1374
	X_3	0.0952
	X_4	0.0908
	X_5	0.0337

资料来源:《中国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安虎森(2008)通过比较各指标的重要性,得到判别矩阵并计算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如下:

$$\text{判别矩阵 } A = \begin{bmatrix} 1 & 9 & 7 & 7 & 9 \\ \frac{1}{9} & 1 & 1 & 3 & 5 \\ \frac{1}{7} & 1 & 1 & 1 & 3 \\ \frac{1}{7} & \frac{1}{3} & 1 & 1 & 5 \\ \frac{1}{9} & \frac{1}{5} & \frac{1}{3} & \frac{1}{5} & 1 \end{bmatrix}$$

最大特征根为 $\lambda_{\max} = 5.4202$

$$\text{对应的特征向量 } W = \begin{bmatrix} 0.9577 \\ 0.2047 \\ 0.1419 \\ 0.1352 \\ 0.0502 \end{bmatrix}$$

对上面矩阵的特征根计算一致性指标 CI,采用

的公式为 $CI = \frac{\lambda_{\max} - M}{M - 1}$,其中 M 为矩阵的维数,代入得 $CI = 0.10505$ 。

一致性比例 $CR = \frac{CI}{RI}$,当 $CR < 0.1$ 时,认为判别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否则不能通过一致性检验(孙红玲,2007)。由于维数 $n = 5$,根据表 3 可得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 1.12$,则得 $CR = 0.0938 < 0.1$,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 3 指标值

维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RI	0.00	0.00	0.52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1.49	1.52	1.54	1.56	1.58

资料来源:《中国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根据前面得到的各个基础指标权数以及标准数据库,利用线性加权法计算顶层指标,得到综合指标数值 Y_i 。表 4 列出了测算数值。

表 4 实证分析结果

分区	综合指标数值	区内排名	综合排名
中心区	0.82		1
滨海新区	塘沽区	1.57	1
	汉沽区	-0.56	3
	大港区	0.66	2
	区内均值	0.57	
新六区	东丽区	0.81	3
	西青区	1.26	1
	津南区	-0.21	4
	北辰区	0.90	2
	武清区	-0.72	5
	宝坻区	-0.91	6
区内均值	0.19		
三县	宁河县	-0.87	2
	静海县	-0.63	1
	蓟县	-1.00	3
	区内均值	-0.83	
市内均值	0.19		

资料来源:根据《天津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版)和《中国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计算整理

为了能更直观地表现各区县的经济水平差异,图 1 根据上面测算的结果绘制柱状图。数据表明,天津市各区县的经济水平评价指标的均值为 0.19;中心区为 0.82;滨海区平均 0.57,仅次于中心区;新六区平均 0.18;三县水平最低,仅为 -0.83。

可见,天津市市内各区县差异非常明显,且区域内部经济水平也出现分化,使城市整体应有的发展潜力远未得到释放。各区存在的问题不同,主要表现为: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无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接,中心区与现代服务业直接相关的、滨海新区内为提高物流效率而亟须升级的以及三县改善农业和交通的基础设施都没有到位;二是产业结构失调和升级滞后,如中心区、新六区和三县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类似问题;三是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有代表性的市县为新六区和三县;四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严重浪费,主要集中于新六区和三县。

出现经济差异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首先,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和趋利性。有些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源)本身就不可流动,而那些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知识及技术)有时也因为受到某些外界限制而无法发挥其原有的流动性。正因为要素的非流动性特征和分布的非均匀性使与这些生产要素相关的经济活动不可能在空间上均匀分布。由于生产要素的趋利性,当某一区域的回报率高于其他地区时,则要素会流入回报率高的地区,进而出现要素密集度的差异,继而产生地区经济差异。其次,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任何经济活动间都是相互联系的,而这种相互联系总是与一定的空间范围联系在一起,企业生产工序空间分割的非经济性、规模经济、聚集经济、交易费用的节省,都要求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尽可能聚集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不可能在空间上随意分散分布(安虎森,2008)。最后,中心地区的区位锁定作用和知识溢出的局部性。罗默认为,一般知识产生外部经济效应(知识的水平

效应),专业化知识产生内部经济效应(知识的垂直效应),二者结合使知识本身以及资本、劳动力等非知识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保证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专业化知识积累的差距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要素收益率的差距使不同区域间产生创新能力的巨大差距。知识还有水平效应,即知识可以溢出,

这种溢出可以降低其他企业的学习成本,增加知识积累,提高经济效率。然而这种溢出只是局部溢出,即强度会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弱,称为知识和技术溢出的空间衰减率。两种效应的相互综合构成了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成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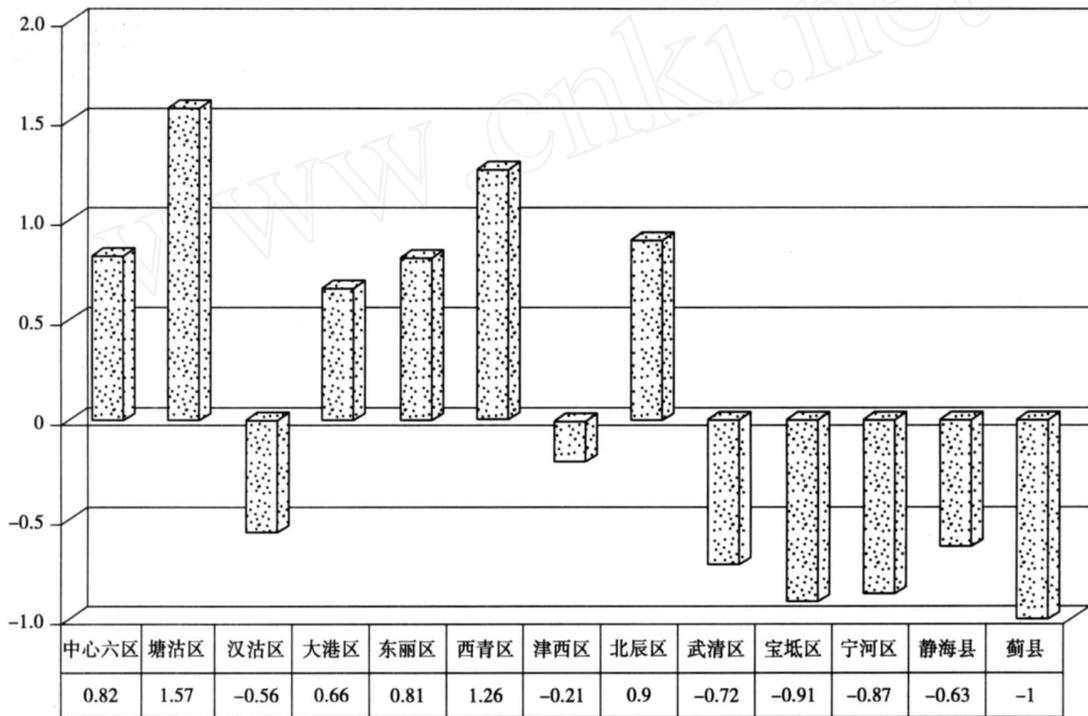


图 1 天津市各区县综合经济差异水平

四、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单纯依靠市场无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需要政府主动干预经济活动。政府财政承担着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收入分配以及实现社会稳定的职能,因此,可以充分利用现有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财政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两翼”调节有效需求,二者之间共同发挥缩小地区差异的作用。

自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赋予了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上的一定自主权,但是由于税收立法权力的高度集中,地方政府对税种的开征、停征、减征税、免税以及确定税率和征收范围等的管理权限仍旧很小。税收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调节主要通过选择性税收政策来实现,即有重点、有选择地运用税收优惠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税式支出解决区

域经济增长中的某些突出矛盾,以此来反映政府的阶段性经济政策。针对特定纳税人或特定课税对象,一般采取税收减免、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延期纳税、加速折旧等形式。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差别税收政策,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其能够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性调节作用。

天津中心区、滨海新区、新六区及三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自的优势和存在问题也不相同,但政策的最终目标都在于调整产业、产品和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供求,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从而为促进全市经济协调发展铺平道路。而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存在着改革不彻底、政策灵活性不强的实际问题,地方政府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可供选择的政策工

具十分有限。比如,近年来天津市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而这些经济成分在活跃市场经济和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利于新六区及三县内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全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在金融危机下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然而,虽然地方财政在企业税费优惠、政策贴息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所采取的财政手段相对十分有限,政策绩效也很难估算;同时,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受政治晋升压力的约束,每年需要保证本级财政收入的增收比例,无法对地方性企业提供更多的税收支持。虽然随着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一些政策,甚至考虑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进行融资,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缩小区域增长差距,但是政策的实施情况尚有待观察。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政府重启积极财政政策,并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可以说,这是政府近年来采取的最“令人振奋”的经济刺激方案,同时也是最直接、见效最快的宏观调控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是一级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对财政资金进行的再分配。生产性公共投资的增加也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生产要素积累的收益率短期内不会发生递减趋势,长期增长率将大于零。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生产性公共资本、人力资本和研发活动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动力。然而,就目前情况看,为了确保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和方向主要用在纠正市场失效和低效范围内,在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以及在中央政府补助下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不能介入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即使是基础设施领域也要尽可能借助市场力量,以发挥用较少资金带动更多项目的政策作用,将资金投向用于相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充分利用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推动社会分配趋向公平。

从天津市的各个市县的比较情况看,新六区和三县的经济起步晚于中心城区,其科学文教水平相对落后,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科学文化的发展将不断提高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素质以及劳动工具的质量,

并改善三者的结合方式,其对物质财富生产的贡献将越来越大。所以必须将这个阻碍该区经济取得高效、长足发展的隐患清除;同时,该区许多公共服务、交通设施的水平相对中心区较落后,不利于对外经济交流联系,且无形中增加了运输和物流成本,不利于吸引内外资。另外,新六区和三县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于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但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以及农业科技水平的限制,第一产业的潜在产能被弱化了。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决定着生产活动的发展水平、投资环境、文化氛围及人民生活质量,故这些“瓶颈”亟待通过财政政策撬动经济,以实现有效突破。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天津市在我国大中型城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我们的研究,认为天津市各区县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同时我们还认为,这种经济增长差异在其他城市中也不程度地存在。这种差异一方面来自于城市内部的区位优势所带来的资源配置上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政策层面的支持和资金的倾斜不当所带来的结果。这种经济增长的差异不仅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还会产生由于不公平分配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当前,在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尚未雨过天晴之际,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这种业已存在的差异过大并进而纠正市场失灵,以避免在危机过程中进一步放大分配差距过大的社会问题,是各级政府需要认真思考并着力解决的实际问题。

由于财政本身所具有的调控特点,至少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实施积极的政策取向会收到相对乐观的实际效果。然而,由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在获得事权的同时并没有取得与之相对应的财权,在税收立法权力等方面也具有局限性,单纯依靠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实行有针对性的结构性财政调节十分有限;同时,在地方政府“锦标赛式的竞争”(周黎安,2004)驱使下,地方性财政支出用于平衡增长差异的效果则更加减弱,即使是在中央政府拨付缩小分配差异的转移支付资金和用于应对金融危机的专项资金,其实际使用渠道和方向也会成为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

(傅勇,张晏,2007)的代价。因此,利用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契机缩小区域增长差异,来自于中央财政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和体制性监管都显得尤为必要。

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在于:首先,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选择性财政资金投入,制定较为明确的公共投资导向,推动地方经济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下走向复苏。其次,采取鼓励民间投资的激励计划,建立地方财政融资基金,发挥财政的汲水效应,对民间投资实行配套支持。再次,在中央政府的监管下扩大地方发债能力和规模,鼓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经济特点发行债券,并且对于具有明确指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小增长差距用途的债券给予优先发行和优惠利率,用于补足地方政府财政缺口。复次,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用于缩小区域差距的转移支付资金规模,缩小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增长差距。最后,对税收支出实行有保有控的调整,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大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的范围和程度,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等行为主体创造更多的政策条件。

参考文献:

- [1] 林毅夫,刘培林.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 [J]. 经济研究, 2003(3): 23-29.
- [2] 王银平,张宏伟,张雪花. 天津市发展水平差异性研究 [J]. 天津工业大学学报, 2007(2): 15-18.
- [3] 陆大道. 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 [J]. 地理研究, 2003(3): 8-11.
- [4] 夏禹龙,冯之浚. 梯度理论与区域经济 [J]. 研究与建议, 1982(8): 5-7.
- [5] 欧向军.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方法与实证——以天津为例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 [6] 安虎森. 新区域经济学 [M]. 辽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 [7] 苗润生,等. 中国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方法研究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8] 吴伯均,钱世超,等. 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研究 [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 [9] 沙安文,沈春丽,等. 地方政府与地方财政建设 [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5.
- [10] 胡欣. 中国经济地理 [M].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5.
- [11] 厉以宁. 区域发展新思路——中国社会不平衡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对策 [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
- [12] 刘再兴. 中国区域经济:数量分析与对比研究 [M]. 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3.
- [13] 孙红玲. 中国横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 [14] 权衡. 中国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5] 周立群. 创新、整合与协调——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前沿报告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 [16] 郭亚军. 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2.
- [17] 朱庆芳,吴寒光. 社会指标体系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8] 王晓鲁,樊纲. 中国地区差距:20年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 [19] 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J]. 经济研究, 2004(6): 33-40.
- [20] 傅勇,张晏.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J]. 管理世界, 2007(3): 4-22.

(编辑:南 北;校对:段文娟)